

崔天凱大使接受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採訪實錄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直新闻

4月3日,崔天凱大使在華盛頓接受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節目連線採訪,就新冠疫情、媒體關係、中美關係等回答了提問。有關節目已于4月11日起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各平台播出。全文實錄如下:

布雷默: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很高興見到您,非常感謝。

崔大使: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布雷默先生,這次是在屏幕上。

布雷默:是啊。首先告訴我,您最近怎麼樣?看起來您應該是在使館落實居家令。還好嗎?您現在在家嗎?

崔大使:我在使館。我仍然每天上班,因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維係兩國政府間的溝通,幫助美國公司解決從中國運送抗疫物資到美國的具體問題,還要同媒體交流。我們在美國還有人數眾多的中國公民,尤其是留學生。坦白說,他們有些憂慮。我要照顧好他們,與他們溝通,努力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布雷默:**我知道美國國務院因處理美國在外公民回國的問題已經不堪重負,也許這是過去幾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嗎——處理在美國公民相關事務?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護海外公民也許是所有政府都面臨的艱巨任務。在這方面我與美國國務院感同身受。但我們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很多華裔人士在美國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據我瞭解,他們中認真考慮回國的並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來情況會怎么發展。但對很多學生來說,他們遠離父母家人,其中一些學生簽證很快就要到期,因為美國學校通常到5月左右就會結束學期,有的甚至都沒有經濟資助了。所以坦白說他們現在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布雷默:當然美國政府現在忙于處理這一史無前例的危機。我記得美中兩國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時候,您與姆欽財長要保持經常性溝通,我想問的是,疫情是否影響了您或您的政府保持與美國政府適當層級的經常性聯繫?

崔大使:我要說的是,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達成主要歸功于兩國經貿團隊。他們為這個協議付出了近兩年的努力,達成協議也是為了互利共贏。據我瞭解,儘管過去數周我們面臨着這樣的嚴峻局面,大家還是在努力落實第一階段協議。相信我們能繼續落實。

布雷默:但美中兩國現在需要應對一系列嚴峻挑戰,難度可能超出第一階段協議的落實。美中關係現在的性質如何?您認為雙方還是保持着適度開放嗎?這種開放程度是否適宜?開放得夠不夠?兩國之間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嗎?您怎么描述當前的關係?

崔大使:我想可能沒法用一兩句話來回答這些問題。中美關係是如此複雜且涉及方方面面。幸運的是,在領導人層面,兩國元首保持了良好溝通。就在上周,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進行了長時間、建設性的通話,他們一致認為兩國應合作抗疫,現在是需要團結合作的時刻。我們使館現在主要有以下三項工作,可能還不止三項。第一,我們要推進兩國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不管是關於醫療物資的還是關於兩國疾控中心、研究機構技術合作的,使館都竭力推動雙方溝通協調。上周日(3月29日),兩國疾控中心又召開了技術性視頻會議。第二,正如兩國元首之間及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達成的共識,我們要共同努力,穩市場,促增長,保就業,保民生。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工作重點。對於我和使館來說還有一項工作也同樣重要,坦率講,就是確保一個有利于兩國合作的輿論民意氛圍,這和前兩項工作一樣很艱難,但很重要。除此之外,我們要照顧這裡的華僑、留學生,我的職責還包括照顧好使館同事和他們的家人。

布雷默:您的工作的確很多。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也許我先從宏觀的角度談談這個事實,即中國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危機的挑戰。一開始疫情在中國爆發,現在我們在美國也面臨疫情,確診數字是此前想象不到的。我們先聊聊這個。您認為中國現在在應對疫情方面情況怎樣?您和中國人討論時有什么感受?

崔大使:我想幾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對病毒和疫情毫無準備,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幾個月前極少有人甚至沒有人對它有任何瞭解。這是一個不斷加深對病毒認識、不斷瞭解如何應對的艱難過程,是對所有人的挑戰。我們是最先應對這一艱難局面的國家之一,為此付出了艱苦努力和高昂代價。現在中國的情況在好轉,確診病例已經較少,目前還有約3000個確診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較之前我們對如何治療已經有了更多瞭解。我們還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時重啟經濟,恢復正常經濟社會活動。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們知道,單靠自己無法成功完成這項任務,我們要為國際抗疫合作貢獻力量,因為除非疫情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控制,否則包括中美在內,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還在努力。

布雷默:中國在應對這一危機方面比其它國家積累了更多經驗。您對美國政府接下來如何應對有什么建議?有什么經驗教訓?

崔大使:在公共衛生方面我給不了任何專業建議,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們從本國及其他國家經驗中瞭解到一點,那就是必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做到。我們要挽救生命,保護人民健康,尤其是保護好弱勢群體,包括老人、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和窮人。我們要把這一點作為重中之重,為此不惜代價。



第二點,我們確實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要摒棄利用他人苦難謀取政治私利的行為。遺憾的是,在這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還是有人企圖这么做。我們要共同努力,堅決反對這種圖謀。長期來看,還要從此次疫情中吸取經驗教訓。過去數年,很多人都在討論大國間的戰略競爭,討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很少有人預計到這樣一種看不見的病毒會對我們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所以,必須要認真思考我們面臨的真正威脅是什么?真正的敵人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應如何在世界範圍內應對諸如此類的全球性挑戰?

布雷默:您感到憂慮嗎?這是個全球化的時代,

提出的G零觀點進行更多認真思考。無論在全球經濟還是公共衛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沒實現良好運行,人們必須認真思考應建設怎樣的全球治理,我們的目標是什么。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已經歷數個危機。從911恐怖襲擊,到金融危機,再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經歷了安全挑戰、金融動蕩以及現在的公共衛生危機。儘管我認為我們早就該覺醒了,但如果我們還沒有開始覺醒、還能稱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么現在是時候我們來付出努力、構建一個良好的面向21世紀乃至未來的國際治

理體系了。

同時,這也取決于我們的目標是什么。如果我們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種政治體制或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我認為我們不會成功。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各國相互尊重,充分認同文化、文明、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多樣性,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我認為建立一個有效的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已經具備條件。我們現在必須做出正確選擇。

布雷默:大使,我非常明白您的觀點。您說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現有機制將無法有效地發揮作用,您指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嗎?這是您所指的嗎?

崔大使:平心而論,這些機構都在盡最大努力進行改革和改進,來適應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份額制度及如何回應成員國需求等進行了重大改革,它們做出了很多努力。這些機構在最近的G20峰會上也表示要提供幫助,願發揮應有作用。我們當然要鼓勵它們做得更多。對世貿組織而言,很遺憾多哈回合談判沒有成功。(世貿組織)很多規則是在新技術出現之前制定的,我們確實需要支持它改革,使其與時俱進,更有能力應對挑戰。公平地說,這些組織里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跟多邊機構打過多年交道,我知道有一種說法:國際組織的成效取決于其成員國。因此,我們成員國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布雷默:我要問的是,展望未來三五年時間,正如您所說,一些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國際機構已不足以應對當前任務,這個論斷很直接,那您認為這些機構經過改革之後會具備足夠能力嗎?還是我們需要新的架構,來自中國或其他一些國家?您認為我們將沿着二者中的哪一個方向走下去?

崔大使:坦率地說,如果現有國際機構能夠對其成員國的需求和願望進行及時有效回應,我指的不僅是其中幾個而是所有成員國,那么它們就可以通過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職責,否則,成員國就會被迫考慮建立新架構的可能性。但我確實希望我們可以對現有國際機構進行改革,使它們變得更好。

布雷默:我們來說說美國和中國,顯然這兩個大國有能力實施刺激性措施,確保我們度過這場經濟危機。您和我也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具備這種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準備籌集大量資金,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避免其走向崩潰。當我們開始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最糟糕的經濟狀況時,是否應該期待中國更多地扮演領導角色,並提供更多資金,為緩解危機做出貢獻?

崔大使:事實上,中國一直非常積極地參與這一

進程,特別是過去十年積極參與了國際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努力。我們增加了對這些機構的出資,現在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繳納國和第二大維和經費出資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我們的貢獻在增加,正竭力為國際社會做更多事,因為我們堅信各國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緊密相聯,休戚與共。當然,也希望美國能繼續做更多的事情。

布雷默:這些機構設立的時候是西方機構,如果現在中國人在出資和貢獻方面佔據最大份額了,可能會要求附帶什麼樣的條件呢?例如,在這些組織負責人的任命上擁有更大發言權,或者改變投票權和份額,或者是還貸方式和附加條件?隨着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國政府是怎么考慮的?

崔大使:不同組織擁有不同架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是基于成員國的認繳份額,因此如果我們貢獻更多,投票權自然更大。對於聯合國而言,所有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兩國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只有一票。當然安理會不是如此,我們是常任理事國,有更大責任也確實需要貢獻更多。但中國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們希望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得到廣泛遵守。如果這些原則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落實和尊重,僅就自身而言,我們並沒有更多別的“追求”。

布雷默:顯然,我們看到在這場危機之後,中國經濟恢復最快。中國對於醫療物資和醫護人員的分配也至關重要。您是否認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扮演着與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認為中國借此次危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為全球領導者?如果是這樣,這是精心部署的戰略嗎,還是只是被動反應?您認為中國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稱:這是中國應該發揮領導作用的時刻?

崔大使:如果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當然希望這一切不要發生,因為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危機。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因為我們堅信各國同屬人類命運共同體,只要還有一個國家發生疫情,就沒有人是安全的,我們必須幫助別人。我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正竭盡全力幫助他人挽救生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在幫助自己。如果其他國家仍在苦苦掙扎,中國就無法免除毒侵害。因此,我們在幫助他人,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通過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所謂的“世界領袖”,因為我們從不相信世界需要一個領袖國家,我們堅信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當然,有些國家更強大,能力更強,應該做出更大貢獻。我們願意做出貢獻,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間真正的尊重,同時希望大家能充分認識到國家間的差異會繼續存在,我們應該將這些差異視為多樣性、互補性,而不是對抗或衝突的來源。

布雷默:世界各國對中國有怎樣的回應?我們看到中國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躍,積極給予各國人道主義支持,特別是美國的主要盟友歐洲。這些政府具體做出了怎樣的回應和反應?

崔大使:大家當然歡迎我們的幫助。我們也在盡最大努力提供技術支持和醫療物資,並與他們分享抗疫經驗。但我們也清楚地表明,中國採取的措施是基于中國的國情與環境,例如我們人口眾多,許多國家並沒有那么大的口口規模,我們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對中國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適合其他國家。我們一直在說,各國必須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一套適用自己國家的整體策略。但是就技術和醫療援助而言,我們願意提供幫助。

布雷默:讓我來問一些更具挑戰性的問題,也許從中國內部事務開始。顯然有很多批評認為中國政府最初對於疫情的爆發式增長有所隱瞞,尤其是對“吹哨人”李文亮做法。他雖然後來被當地政府“平反”,但一開始是被噤聲的。中國政府從疫情應對的早期失誤中吸取了什麼教訓?

崔大使:我想說的是,美國媒體的一些報道或者美國政客們聲稱的一些事情並不符合事實。我來和你談談事實。你提到李文亮醫生,他是個好醫生,是個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醫生是一名眼科醫生,並不是病毒方面的專家。他的確向同事發出了警告,但事實上他並不想將自己的警告公之于眾,不知何故這條信息傳了出去。

其實在他之前,武漢就有一位女醫生收治了三個不明原因發熱的可疑病例,她馬上上報,一兩天之內當地疾控中心就派專家到醫院調查。第二天,也就是這位女醫生上報三天後,當地疾控中心向當地所有醫院發出提醒,提示發現不明原因發熱的可疑病例。當時是12月底,首次上報是在2019年12月27日。之後的2020年1月3日,中方就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這一特殊情况,也就是說幾天內我們就向所有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通報了信息。第二天,中美兩國疾控中心專家進行了首次溝通。我不是醫學專業人士,無法告訴你這樣的通報